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12, 2192–220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2192

生命意义寻求的原因：成长抑或危机*

李占宏[1]　赵梦娇[2]　刘慧瀛[3]　刘亚楠[3]　彭凯平[1]

([1]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84) ([2]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0)
([3]郑州大学教育学院，郑州 450000)

摘　要　生命意义寻求指追求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发现或确立生活目的、或者寻求生命重要感的动机和努力。当前，学界关于意义寻求的动因并未达成共识。“缺失恢复观”认为生命意义寻求的动力缘于意义缺失，意义一旦恢复，个体的寻求努力便会衰减；而“生命肯定观”则主张生命意义寻求的动力缘于对自我生命意义体验的巩固和加强，个体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将永远保持不竭的动力。本文介绍和讨论了两种观点的证据、不足和适用情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该模型假设意义寻求以意义需求为前提，认为只要知觉到的当前意义低于或高于原有意义水平，就会诱发意义寻求动机。未来研究亟需编制多维意义寻求量表、加强该领域的实验研究并探索影响意义寻求判断的因素。

关键词　生命意义感；意义寻求；缺失恢复；生命肯定

分类号　R395

1　引言

意义(Meaning)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人不能忍受没有意义的生活(Wong, 2014)。生命意义体验(Meaning In Life)与生活中一系列积极和健康指标紧密相关，如快乐、幸福、生活满意度、复原力、困难应对技巧、希望、感恩、身体健康、自尊和授权能力等，而缺乏意义则与一系列消极和非健康指标，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酒精和毒品滥用、物质主义和无聊等联系在一起(Schulenberg, Baczwaski, & Buchanan, 2014)。生命意义无论对生活幸福还是身体健康都有重要作用(Heintzelman & King, 2014)。

然而对于人们何时寻求意义，即生命意义寻求的起因是什么，学者们的观点却并不相同。Frankl (1963)认为，寻求生命意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自然的心理过程，个体对意义的寻求是恒久持续的，对意义的追求永不满足。然而，Baumeister (1991)则认为生命意义的寻求是由缺失驱动的，主要发生于基本需要未能满足的个体或需求未能满足的时候。意义一旦得以恢复，人们便失去了继续寻求的动力。前者被称为“生命肯定观(Life affirming hypothesis)”，后者被称为“缺失恢复观(Deficit correcting hypothesis)” (Steger, 2013)。到目前为止，两种观点都获得了一些实证据的支持，但也都有一些矛盾证据存在，研究者还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本文在介绍已有观点及其证据的基础上，剖析了现有研究的局限，并提出了一个假设模型，以阐释意义寻求产生的前提，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为使以下讨论更为严谨，首先需要对生命意义以及生命意义寻求的内涵进行界定。

2　生命意义及寻求的界定

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由三种成分(Tripartite)构成的观点在慢慢取得共识(Martela & Steger, 2016; George & Park, 2017)。比如，King, Hicks, Krull 和 Del Gaiso (2006)等认为“当感觉有超越细节和瞬时的重要性(Significance)、有目标(Purpose)、或者有超越混沌的一致性(Coherence)时，生活就会产生意义感”。George 和 Park (2016)等把生命意义定义为“一个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Coherence)，被有价值目标指引和驱

收稿日期：2017-06-22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107)资助。
通信作者：刘亚楠, E-mail: lynpsy@zzu.edu.cn

动(Purpose)，并且对这个世界重要(Mattering)”。Martela 和 Steger (2016)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人们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做出判断时所依据的内容包括三种成分：一致性(Coherence，认知成分)、目的(Purpose，动机成分)和重要性(Significance 或 Mattering，情感成分)。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Steger 等把生命意义寻求界定为，人们在确立或增加对其生命的含义、重要性和目的性的理解时所表现出来的愿望和努力的强度和活动性(Steger, Kashdan, Sullivan, Lorentz, 2008a)。在本文中，我们采纳上述定义，把凡是追求对自己生命(或生活)的理解、发现和确立生活目的、或者寻求生命重要感的动机和努力都划定在生命意义寻求的范畴内。

3　生命意义寻求起因的两种假说

3.1　缺失恢复观(Deficit correcting hypothesis)

个体在何种条件下会寻求生命的意义？Baumeister (1991)认为，生命意义寻求主要发生在那些遭遇挫折的个体身上。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在未能实现生活目标，或者面对创伤性事件时更愿意寻求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需要对生活的重大方面做出调整，并通过建立新的意义结构重新规划自我的存在。Steger (2013)也认为，对于意义体验，每个人可能都存在一个独特的最佳水平，个体总是为保持这一水平而努力。这种努力类似于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为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在缺乏意义时个体会努力寻求，而当意义超过某一水平时个体就会减弱寻求，最终使得意义体验大体维持在某一水平附近。

缺失恢复观的主旨在于，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但大致稳定的生命意义体验水平，寻求的原因或者动力源于意义的损坏或缺损，意义一旦恢复，个体的寻求努力便会减弱，从而使意义体验水平始终维持在某一最佳水平附近。根据这一观点所描述的生命意义存现和寻求的关系如图 1 中的粗实线所示。这是一条大致的三次曲线，当意义体验(存现)水平很低时，意义寻求水平最高，随着体验水平的提高，寻求努力会逐步降低。曲线的中部有一个平台期，此时体验水平继续升高，而寻求水平大体保持稳定。在这个平台期之后，随着意义体验水平的继续提高，意义寻求的努力会逐步减弱，并且随着意义体验水平的继续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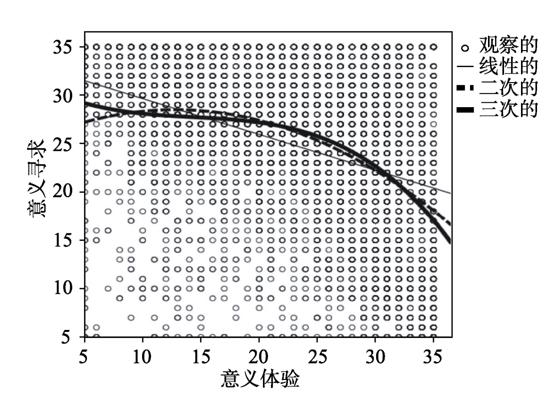


图 1　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The psychology of meaning，第 11 章 Wrestling with our better selves: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Steger, 2013)。

意义寻求水平有迅速减弱的趋势。

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Steger, Oishi 和 Kashdan 等(2009)使用自编的生命意义问卷(MLQ-P 和 MLQ-S)调查了来自全球各地，年龄从 25 岁到 64 岁的 6764 名成年人。结果发现，人们的生命意义体验水平(MLQ-P 分数)与寻求水平(MLQ-P 分数)呈现图 1 所示的趋势。在三条拟合两个变量关系的曲线中(分别为 1 次、2 次和 3 次曲线)，反映缺失恢复观的粗实线(3 次曲线)对数据拟合得最好。根据这条曲线，生命意义寻求的最高水平出现在生命意义体验水平最低时。随着体验水平的升高，寻求水平逐步降低。在曲线的中部，随着意义体验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个寻求水平几乎不再变化的平台。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意义寻求水平随着体验水平的上升而出现急剧的下降。

大量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研究为缺失恢复观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意义建构理论(Meaning Making Theory, MMT)认为，(a)每个人都有一套所谓的“整体意义” (或“整体信念系统”)，它为人们解释自己的经历和行为动机提供认知框架；(b)当个体遭遇挑战整体意义的事件时，就会对其进行评价并赋予其意义；(c)事件被赋予的意义与整体意义的不一致导致个体体验到痛苦，并且不一致的程度决定了痛苦程度；(d)不一致导致的痛苦会激活意义建构过程；(e)通过意义建构，个体努力减少事件被赋予的意义和整体意义之间的差异，恢复“世界是有意义的、生命是值得活的感觉”；(f)重构意义是对应激事件的适应。那些突然出现且无法预测的创伤事件破坏了整体信念系统。因此，创伤性事件所以痛苦的原因，在于它们

破坏了人们关于自己和世界的许多基本假设，个体在这种痛苦之下便会开启生命意义寻求的过程，即意义缺失或破坏导致了意义寻求(Park & George, 2013; 赵娜，马敏，辛自强, 2017)。

实证研究支持上述假设。Schwartzberg 和 Janoff-Bulman (1991)调查发现，90%失去亲人的大学生会问“为什么死的是我的父亲/母亲”。Davis 等发现，人们在经历丧失或创伤性事件之后，会沉浸于对死亡的思考并反复寻找事件的原因(Davis, Lehman, Wortman, Silver, & Thompson, 1995)。Uren 和 Wastell (2002)发现，超过 80%失去孩子的母亲会努力试图弄明白孩子的死亡原因。许多逆境应对的研究显示，人们面对创伤事件时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 (Thompson, 1991)。在总结了对强奸受害者、乳腺癌患者和 HIV 病毒感染者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后，Taylor (1983)指出，在对威胁性事件的适应过程中，寻求意义往往是第一个过程。

3.2 生命肯定观(Life affirming hypothesis)

然而，按照 Frankl (1963)的观点，人是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灵性(Spirituality)存在，灵性决定了人的生活是以意义为核心的，即每个人都存在着理解世界和超越自身的动机。追求意义是人灵性的一种表达，所以意义寻求应该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Wong, 2014)。一个人越是体验到意义，越是具有更强的寻求意义的动机。上述观点被 Steger (2013)称为“生命肯定观”。

这一观点同样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Steger, Kashdan, Sullivan 和 Otake (2008b)发现，人们在生命意义问卷的意义寻求分量表上的平均得分是 24.8 分(共 5 个项目，在 1~7 点量表上评分)，也就是说，大多数个体对诸如“我正在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这样的描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换句话说，人们大多数时候是关心生活的目的，愿意探索生命意义问题的。这项研究还显示，虽然高意义体验水平的大多数人缺乏继续寻找意义的动力，但确实有少部分个体，虽然意义体验水平已经很高，但仍然报告拥有寻求意义的强烈动机。更重要的是，生命意义寻求与一些象征积极品质的人格特征相联系，表明意义寻求至少是一部分人的持续性动机。比如，Steger 等发现，生命意义寻求与开放性、专注和探寻兴趣(Investigative interests)等特质强相关(Steger et al., 2008b)。Vess, Routledge, Landau 和 Arndt 等(2009)在关于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中也发现，具有低结构需要(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PNS)的个体在面对死亡威胁时，并不像高结构需要个体那样，为了恢复意义而重新确认其珍视的结构，而是与之相反，他们愿意探索新东西、发现新事物。

3.3 对已有证据的分析和评价

纵览已有文献会发现，现有证据之间充满着混乱和矛盾。例如, Steger 等(2008a)以美国被试为样本发现，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呈现负相关，意义体验越低，追求意义的动机越高，这支持了缺失恢复观。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在其它文化下得到重复验证。在一个中国本科生样本中，刘思斯与甘怡群(2010)没有观察到两者之间的相关。另外，在日本的一个年轻人样本中，两者之间却是正相关关系(Steger et al., 2008b)。同样，支持与反对生命肯定观的证据也同时存在。一项探索生命意义体验与寻求随年龄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意义体验水平有缓慢上升的趋势，而生命意义寻求水平则缓慢下降(Steger et al., 2009, Bodner, Bergman, & Cohen-Fridel, 2014)。生命意义体验随年龄增加而增强表面上支持生命肯定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体验到的意义越来越多。然而，意义寻求随年龄增加而下降则又支持缺失恢复观。矛盾现象最主要的证据来自于对意义体验与寻求关系的类型研究。Dezutter 等(2014)调查了 8492 名美国大学生，依据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之间的关系，通过聚类分析将被试分为了五种类型：低体验低寻求、低体验高寻求、高体验低寻求、高体验高寻求以及未分化型，每种类型占总体的比例依次为 9%、15%、18%、23%、35%。由此可见，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的关系非常复杂。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缺乏意义体验，有些个体会启动意义寻求动机，而另外一些个体则不会。拥有高意义体验，有些个体仍然会选择寻找意义，而另一些则停止寻找。也就是说，缺失恢复观与生命肯定观似乎都是片面的。

3.4 混乱证据背后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导致研究之间相互矛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意义寻求的测量不够精确。以上所列举的大多数证据，所选用的测量工具均是

Steger 编制的的生命意义量表(MLQ)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该量表包含 10 个项目，分为两个分量表：生命意义体验(Presence of meaning)与生命意义寻求(Search for meaning)。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所测构念单纯，并且同时测量了生命意义感的情感成分和动机成分，因此被广泛使用(Schulenberg et al., 2014)。不过，由于其项目过于笼统和抽象，故而难以反应生命意义寻求的细节(Wong, 2014)。例如，被试如果不赞同"我正在寻觅人生的一个目的或使命"这一项目，可能是他或她因为预期找不到意义而停止了寻求，也可能是已经获得了意义，觉得没有继续寻求的必要。由于测量精度较差，无法有效区分不同的被试类型，因而也就无法准确预测生命意义体验与寻求之间的关系。另外，该量表也没有区分意义寻求的内容，即个体寻求的是什么，是对生活的理解(Coherence)、目的(Purpose)，还是生活的价值(Significance)。虽然三种成分之间相互影响，但彼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等同(Park, 2010)。

其二，静态地看待意义体验与寻求之间的关系。利用量表探查意义体验与寻求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潜在假设两者具有特质属性，具有跨时间与跨情景的一致性。的确，一年内的追踪研究发现，无论是前测的意义体验，还是意义寻求，均与后测构念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Steger & Kashdan, 2007; 张姝玥，许燕, 2012)。然而，从生命全程来看，无论是意义体验，还是意义寻求，都在发生变化。Bodner 等(2014)发现，意义寻求在 18 至 24 岁到达高峰，之后呈持续下降趋势；而意义体验则不同，18 岁之后开始下降，在 24 岁左右达到低谷，继而又开始持续上升。这一研究表明，无论是意义体验，还是意义寻求，一定程度上是动态、波动的。除此之外，意义寻求动机还会受到情景因素的影响，压力事件就是其中之一。Park 与 Baumeister (2017)认为，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人提供一种世界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感觉。然而，压力事件通常不可控制，这对生命意义感形成了威胁。因此，压力事件会驱动个体寻求意义。他们的研究发现，指导被试想象未来生活中的压力事件，会提升个体的意义寻求水平。类似的发现来自 Graeupner 和 Coman (2017)的研究，当个体觉知到被他人排斥时，会启动意义寻求，进而更可能相信迷信和阴谋论。这些证据都表明意义寻求和意义体验都是动态的，随情景变化的。

第三，没有在需要和动机关系框架下探索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之间的关系。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动机则是激发并维持个体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和动力。动机根植于需要，需要是动机产生的前提。因此，意义寻求动机由意义需求诱发。我们认为，意义需求不单单由当下的意义体验水平高低决定，而是取决于当下生命意义体验的绝对水平与渴求状态之间的差距。缺失恢复观认为，维持机体身心健康需要一定的意义水平，当重大创伤出现，个体觉知到当下的意义水平远低于目标意义水平时，意义需求就会出现，从而驱动个体寻求意义，恢复意义水平。然而，缺失恢复观没有注意到，即使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维持在较高水平，如果有更高的意义目标出现，形成意义需求，仍然会激发个体寻求意义的动机。特质层面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意义体验水平之后，偏相关结果仍然显示，好奇心、经验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认知需求以及趋近动机高的个体，有着更强的意义寻求倾向(Steger et al, 2008a)。这表明某些特质对意义寻求具有增益性，无论意义体验水平高低，都会持续地追求意义。除了特质之外，某些情景因素也能够显著地驱动意义寻求。King 与 Hicks (2009)认为，能够诱发个体敬畏情绪的情景，就是诱因之一。敬畏的诱发源有很多，可以是权威的领导者与上帝，也可以来自壮美的景观 (如龙卷风、大教堂、音乐等)，以及人类的伟大创举(如进化论、精神分析论等科学理论) (董蕊，彭凯平，喻丰, 2013)。知觉到的浩大(Perceived vastness)以及顺应的需要(A need for accommodation)被认为是敬畏的两个核心特征(Keltner &, Haidt, 2003)。浩大意味着面前的事物更强大，更具意义。顺应指的则是调整已有心理图式以适应新经验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些策略或过程包含着意义寻求，即寻求新的意义图式的过程。缺失恢复观只看到意义受损会驱动意义寻求，没有意识到积极、正性、更浩大的诱因也是驱动意义寻求的因素。与缺失恢复观不同的是，生命肯定观主张，即使是那些高意义体验的个体，也有持续寻求意义的动机。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双高个体的存在，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然而，高体验低寻求个体同

样存在，并且与双高个体相比，前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并未受损(Dezutter et al., 2014)。这表明即使不再寻求意义，维持一定的意义体验对保持健康已经足够。这一证据揭示了生命肯定观的局限性，并非所有个体都在不断地寻求意义。

4 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

综上所述，缺失恢复观与生命肯定观都不足以解释现有证据。简言之，意义寻求并非到达一定水平就衰减，也并非持续不断，它的启动或发生需要一定前提条件。查阅国内外文献，未发现对此进行阐释的理论或模型。基于意义建构模型(George & Park, 2016; 赵娜，马敏，辛自强，2017)、意义维持模型(Proulx, Inzlicht, & Harmon-Jones, 2012; 左世江，黄旎雯，王芳，蔡攀，2016)以及相关实证研究，我们提出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以阐释启动意义寻求的条件(见图 2)。

新模型是对缺失恢复观与生命肯定观的继承和发展。与缺失恢复观一致的是，新模型同样认为，当意义受损后个体会启动寻求以恢复意义。不同的是，新模型并不认为意义到达一定水平时寻求动机必然下降。与生命肯定观一致的是，意义寻求可能持续存在，但这需要一定的条件。具体来说，当意义体验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后，更高水平的诱因存在是启动意义寻求的前提条件。这一诱因可以是个体是否意识到有更值得追求的意义存在，也可以是某种情景性的因素。

4.1 基本观点

借鉴意义建构模型(The meaning makeing model, Park & George, 2013)的基本思路，我们同样认为意义寻求源于情景意义评估与整体意义框架不符所诱发的意义违反。整体意义框架由三种元素构成：个体的信念系统(Global beliefs)、生活的首要目标(Global goals)以及主观生命价值感(Subjective sense of significance)。信念系统构成了个体解释生活经验的核心图式，是个体理解自我、世界、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框架。信念的种类很多, Koltko-Rivera (2004)将其分为人性、意志、认知、行为、人际、真理、世界等七大类共计 42 个维度。以人性信念为例，包含了人性善恶、可改变性以及复杂性三个子维度。整体目标指的是所渴求事件、过程或结果的内部表征(Austin & Vancouver, 1996)，个体通常报告的整体目标有五类：关系、宗教、知识、成就与工作(Emmons, 2003)。目标以层级的形式组织，上位目标更能代表整体目标(Vallacher & Wegner, 1987)。整体意义框架中的第三个成分是主观生命价值感，是个体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主观判断。整体意义框架中的三元素是个体与环境多次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以上元素，个体形成自身独特且相对稳定的生命意义体验，Hooker, Masters 和 Park (2018)将其称之为特质生命意义感，用来区别情景意义评估后生命意义体验的变化。特质生命意义感是相对稳定的。情景意义评估指的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个体如何理解、建构、解释特定事件。对情景事件的意义评估可能与整体意义框架相符，也可能不符。相符时，个体会觉察到意义(Meaning detecting) (King & Hicks, 2009)。两者相符上升到意识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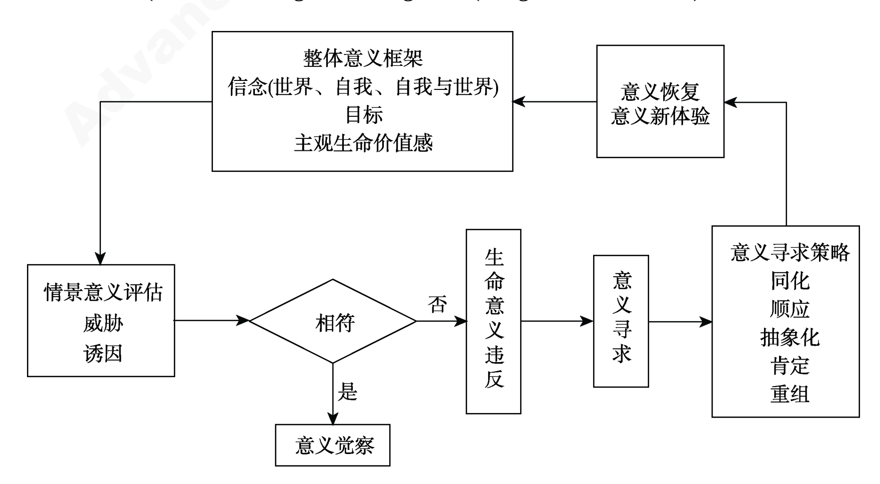


图 2 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

后，个体会觉察到事情在正确的方向上(The rightness of direction)，有一种“对，就是这样”的感觉(Mangan, 2001)。意义觉察可以发生在个体忘我地投入某种活动所产生的心流(Flow)体验(Csikszentmihalyi, 1990)，或者当目标由内在动机驱使的时候(Ryan & Deci, 2000)。

当情景意义评估与整体意义框架不符时，意义违反就出现了。意义违反(Meaning violation)是意义维持模型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当前经历与个体根据自身理解所产生的预期不一致，进而导致原有的理解被破坏的状态(Proulx & Inzlicht, 2012)。在新模型中，威胁与诱因两种刺激均可以诱发意义违反。与个体目前稳定的意义体验水平相比，威胁刺激会导致意义体验下降，而诱因使得个体意识到更强意义体验的存在，导致意义体验的不平衡状态，进而驱动意义寻求动机。意义维持模型认为，在意义遭到破坏后，可以通过同化(Assimilation)、顺应(Accommodation)、肯定(Affirmation)、抽象化(Abstraction)和重组(Assembly)来修复。同化是通过对违反意义的事件进行重新解释、修饰，使其符合现有的意义系统；顺应则是指调整现有的意义系统，使得意义违反事件可以被合理解释。肯定策略是一种补偿策略，指的是在意义违反后，个体会强化已经持有的意义系统，更加肯定其正确性。恐惧管理研究发现，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ce)会增加个体所持世界观的正确性判断。个体会更加追求公正、惩罚不道德的人(刘亚楠，许燕，于生凯，2010)。抽象化策略指的是在意义违反后，个体寻找或创造事物之间联系的能力增强。重组策略与顺应策略有相似之处，指的是对现有意义系统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以解释当前事件。不同的是，顺应策略是对某个单一的关系表征做出调整，而重组则涉及多个关系表征。也就是说，重组策略对现有意义系统的调整更大一些(左世江等, 2016)。通过以上策略，个体将受损的意义体验恢复到正常水平，或者获得更高的意义体验。意义恢复后，整体意义框架没有变化，而新的意义体验会改变整体意义框架中的子成分。

新模型整合了缺失恢复观与生命肯定观两种观点，可以推演出一系列假设，其中多数假设已有实证研究支持，部分假设尚需未来研究检验。假设一：创伤性事件将显著降低当前意义体验水平，打破与原有特质意义感之间的平衡，从而驱动个体寻求意义的动机。如前所述，这一假设已有大量文献支持。例如，存在低意义体验、高意义寻求个体(张姝玥，许燕，2012)、低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正相关(Steger et al., 2008a)、情境性威胁(如社会排斥)增强意义寻求动机(Graeupner & Coman, 2017)均是有力证据。然而，并非所有威胁情景均能启动意义寻求动机，Park 和 Baumeister (2017)发现，一般压力事件并不能增强意义寻求动机，何种负性事件足以驱动意义寻求，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假设二：当个体的意义渴求水平很低时，低意义体验也无法启动意义寻求。意义渴求水平存在个体差异，低渴求水平与低意义体验无法形成差值，会导致意义寻求动机无法生成。在 Dezutter 等(2014)的聚类分析中，确实存在低意义体验低意义寻求的个体。Schnell (2010)也有类似的观点，意义寻求主要源起于意义危机，而非意义缺乏；假设三：即使个体体验到了高水平生命意义，只要知觉到诱因存在，意义寻求动机就会被激发。诱因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意义，进而形成了与当下体验的不平衡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诱因既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来自于外部环境。聚类分析发现存在高意义体验高意义寻求个体，表明某些特质的个体能够自发地寻求更高水平的意义(Dezutter et al., 2014)。高认知需求、开放性、好奇等特质与此相关(Steger et al., 2008b)。外部诱因是否能情景性地提升意义寻求，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研究，留待未来检验；假设四：如果没有诱因存在，高意义体验者寻求意义的动机会降低。聚类分析揭示了高意义体验低意义寻求个体的存在。高认知闭合、教条主义与此相关(Steger et al., 2008b)。

4.2　更多衍生假设与相关实证研究

依据模型的基本观点，我们推演出了一系列基本假设。近年来，生命意义感的构成成分逐渐清晰，使我们可以依据新模型衍生出更多具体假设。学者们普遍认为，生命意义感由一致性(Coherence)、目的(Purpose)和重要性(Significance)三种成分构成。三种成分协同作用，相互影响但又彼此不同。一致性、目的和重要性分别是意义感的认知成分、动机成分和情感成分。理解生活(一致性)是设定目标，发现生活价值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同样，目的与重要性也有所区

别。目的与未来定向密切相关，重要性评价则既可以来自过去经历、现在的感受，也可以是未来目标。三者彼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Martela & Steger, 2016; George & Park, 2016)。George 和 Park (2017)开发了三维度生命意义量表对此观点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三维度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信度，对其他相关意义变量的预测效度也更加精确。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虽然三种成分相关密切，但彼此具有独立性。一项纵向研究发现，精神性可以预测其后的意义体验，但目的的预测变量却是社会支持而非其它变量。基于以上研究，我们推测意义寻求也应该包含三种彼此紧密相关又相互独立的元素：一致性寻求(Search for coherence)、目的寻求(Search for purpose)与重要性寻求(Search for significance)。另外，上述模型假设在意义系统受到威胁或者诱因驱动两种条件下均可产生意义需求。受到威胁时，意义体验下降，被诱因驱动后，意义体验获得情景性提升。根据意义需求产生条件不同(威胁 vs 诱因)，以及寻求的内容的不同(一致性寻求 vs 目的寻求 vs 重要性寻求)，可将寻求的条件分为六类：一致性受到威胁、一致性被诱因驱动、目的受到威胁、目的受到诱因驱动、重要性受到威胁、重要性被诱因驱动。

4.2.1 衍生假设一：一致性受到威胁或受新的意义系统冲击引发意义寻求

一致性，又称为可理解性(Comprehesion, George & Park, 2016)，不是指理解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而是主我对生活这一客体的解释和理解。当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整体意义框架中的信念系统不一致时，对一致性的需求就产生了。

创伤性事件通常会威胁到个体的信念系统，最有可能诱发意义寻求。911 恐怖袭击两个月后，有 2/3 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自己正在寻求意义(Updegraff, Silver, & Holman, 2008)。Lepore 与 Kernan (2009)的研究发现，在确诊乳腺癌 1 年后，仅有 14%的受访者报告自己从未寻求过意义。另外，在家庭成员去世后，有 85%的个体会问"为什么是这样"，或者"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Tolstikova, Fleming, & Chartier, 2005)。这些证据都表明重大创伤事件会诱发意义寻求，这是因为对重大压力事件的情景评估与整体意义框架中的某些信念(如"世界是安全的"、"他人是友善的")产生了矛盾。

引发一致性寻求的另一因素可能源自于个体已有的意义系统受到另一强势意义系统的诱导与冲击。文化适应现象为此提供了一个样例。文化可以界定为"任何一种可以满足个体或群体的心理需要而在某一群人中共享并延续的知识传统"(Chiu, Kwan, & Liou, 2013)。共享性(Sharedness)与传承性(Continuity)构成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文化不仅表现为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也可以是商业、组织、阶层、政治、地域乃至学科文化等。文化实质上是一个意义网络(Web of meaning)，包含行为与道德规范、价值标准、信念、脚本、社会活动图式等内容，能够促进群体适应特定的生态环境(Kitayama, Duffy, & Uchida, 2006)。不同文化包含不同的意义网络，因此，个体在暴露于另一文化时，原有意义网络可能不再有效，需要适应新的意义系统，继而诱发意义寻求动机。就我们的知识而言，目前还没有关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或者居所流动性(Residential mobility)与意义寻求两者关系的研究。Eggleston 和 Oishi (2013)做出了与本文一致的预测，认为居所流动性会增加个体寻求意义的动机，但这一假设还需未来实证研究检验。

4.2.2 衍生假设二：目的缺失或者受诱因驱动会诱发意义寻求

目的是生命意义感的重要组成元素。弗兰克尔在提出意义寻求概念之初，只是将生命意义感界定为人们对自己生命中的目的、目标的认识和追求。一致性与重要性两种元素，是近年来研究者对概念内涵扩展的结果。目的作为核心元素，也能从生命意义感量表内容的演化中体现出来。Crumbaugh 与 Maholick (1964)基于 Frankl 生命意义感的内涵编制的第一个测量工具即是生活目的问卷(Purpose in life scale)，其后虽然研究者发展出一系列包含不同成分的测量工具，然而无一例外都涵盖了对目的性的测量。目的缺乏引起意义寻求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支持。Schulenberg 等(2014)发现，知性目标寻求测验(SONG)中的存在性真空(Existential Vacuum)和意义的愿望(Will to Meaning)两个分量表显著正相关。在一项以大学生为被试历时一年三次测量的追踪研究中，目的缺乏不仅正向预测当前意义寻求水平，还可以预测 4 个月及 1 年后的寻求倾向(Negru-Subtirica,

Pop, Luyckx, Dezutter, & Steger, 2016)。

我们认为，意义寻求不仅会在目的缺乏时启动，也常常为个体意识到的更高人生目的所诱发。遗憾的是，目前几乎没有研究直接检验目的性行为与意义寻求之间的关系。一项对社交焦虑患者的日记追踪研究发现，个体的目的性活动可以显著改善其情绪症状、增强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水平(Kashdan & McKnight, 2013)。增加行为的目的性是提升生命意义感的有效方法。这项研究虽然没有考察意义寻求在其中的角色，但我们推测其扮演着中介作用。依据本文提出的模型，我们推测一切诱发个体寻求更高生活目的的刺激，比如创业意向(简丹丹，段锦云，朱月龙，2010)、敬畏情绪(董蕊，彭凯平，喻丰，2013)等，均可以诱发意义寻求动机。未来研究可以用实验检验这一假设。

4.2.3　衍生假设三：重要性缺失或者重要性诱因诱发意义寻求动机

重要性(Significance)是对生命的价值评价，是生命意义感中的情感成分。目的与重要性紧密相关但又彼此不同。一方面，目的是未来的有价值的目标，因而目的性行为可以增强个体对生活重要性的感知。另一方面，两者又分属不同的构念。目的只与未来有关，而对生活重要性的评价可以来自过去经验、当前感受、或者是未来定向。

重要性缺失引发意义寻求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相关研究发现，意义寻求与存在性真空显著正相关，与自尊显著负相关(Schulenberg et al., 2014)。实验研究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极大削弱个体重要性感知，引发意义寻求(Graeupner & Coman, 2017)。另外，一项恐惧管理研究发现，虽然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ce)下，个体会通过坚守自己所持的世界观以达成意义维持，但上述现象只发生于高自尊个体，低自尊个体不会坚守自己的世界观，而是增强意义寻求的动机(Juhl & Routledge, 2014)。这表明缺乏生命重要感的个体，存在性忧虑足以启动意义寻求的进程。

重要性诱因的出现导致意义需求增加也是引发意义寻求的一大因素。就我们的知识而言，目前还没有相关实证研究。我们只能从已有相关研究中进行推论。例如，道德升华感(Moral elevation)的研究表明，当个体目睹他人美德(Moral beauty)后，会感到自己在情感上得到了升华、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同时伴有胸口温暖、喉咙哽咽、流泪等生理反应(Haidt, 2003)。我们推测，道德升华感同时启动了个体对更高、更具价值生活的寻求。也就是说，意义寻求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5　未来研究展望

近 20 多年来，生命意义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界热点之一。截止 2017 年底，在 Pcychoinfo 数据库中，标题包含 Meaning in life 的文献多达 1142 篇。然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学者们对意义寻求的关注似乎少了很多。同样在 Pcychoinfo 中，包含 Search for meaning 或 Quest for meaning 标题词的文献只有 329 篇。虽然从研究广度上看，学者们已经开始探索何人、在何种条件下、为何以及如何寻求生命意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深度仍有待挖掘。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描述了意义寻求产生的各种条件。毋庸置疑，这一模型虽然最大程度借鉴了已有实证研究成果，但仍不免存在主观推测成分，需大量实证研究检验。除此之外，此领域仍有以下问题亟需解决：

5.1　迫切需要编制三维度意义寻求量表

近几年来，三成分说逐渐得到学界认可，生命意义感三因素量表也已开发出来(George & Park, 2017)。与生命意义感丰富的学术文献相比，对意义寻求的研究较少，专门开发的测量工具也不多。目前为止，只有两个量表中包含了对意义寻求的测量。在知性目标追寻测验(SONG)中，包含意义愿望(Will to Meaning)分量表，用来测量对意义的寻求。该分量表包括 8 个项目，如：“我希望将来有令人激动的事发生”，“我打算获取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 (Schulenberg et al., 2014)。除此之外，Steger 等(2006)编制的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也包括意义寻求分量表，其项目如“我正在寻觅我人生的一个目的或使命”，“我正在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两个意义寻求量表(尤其是后者)虽然得到较广泛的应用，但测量均不够精细，未能区分寻求内容的差异。事实上，理解、目的与重要性寻求三者既相重叠，又相区别(Park, 2010)。理解寻求通常发生在对情境事件的解释与整体意义框架中的信念产生严重冲突时，或遭遇无法理解、让人迷惑或感觉神秘的现象时；目的寻求多出现于人生目标缺

失，或面对一个令人激动的新目标时；重要性寻求主要出现于个体无法发现其人生价值，或者更有价值和吸引力的事物出现之时。因此，开发三维度意义寻求量表成为当前意义寻求领域的主要任务。目前，笔者及同事已经完成量表的初步编制工作，希望能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工具。

5.2 理清意义渴求、意义寻求与意义凸显之间的关系

在意义寻求研究文献中，研究者相继开发出了意义渴求、意义寻求和意义凸显量表，三个量表测量的构念并不相同。意义渴求(Will for meaning)包含在知性目标追寻测验(SONG)中，测量的是个体对新的、更令人激动事情的渴望。Schulenberg 等发现，SONG 的维度 1 (“存在的真空”维度)分数与一般痛苦水平、抑郁水平和生命意义追寻水平(MLP-S)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生命意义体验水平(MLQ-P)、生活满意度(SWLS)、生活目的量表(PIL)分数呈现显著负相关。但维度 2 (“意义渴求”)与生活目的水平(PIL)、生命意义体验水平(MLQ-P)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值较低) (Schulenberg et al., 2014)。意义寻求(Search for meaning)测量的是个体寻求意义的动机，包含在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如前所述，在美国被试群体中，意义寻求动机与生命意义感、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显著负相关，与抑郁、自杀意向、焦虑等正相关(Steger, Kashdan, Sullivan, & Lorentz, 2008a)。意义凸显(Meaning salience)量表由 Hooker 等编制(Thoughts of Meaning Scale; TOMS)，包含 10 个项目，测量一日内思考意义问题的频率。意义凸显与生命意义感、生活目的、心理幸福感、积极情绪、活力呈强的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在 0.54~0.61 之间)，与抑郁症状、负性情绪显著负相关(Hooker, Masters, & Park, 2018)。这些文献表明，意义凸显、意义渴求与意义寻求测量的构念是不同的。依据我们提出的模型，意义凸显测量的是日常生活中个体觉察到意义的频率，频率越高，表明目前生活与整体意义框架越契合，身心机能也越健康。意义渴求测量的是对意义的需求程度，由觉知到的情景意义与基线意义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意义渴求与意义寻求并不能等同，渴求虽然是寻求的前提，但渴求不一定诱发寻求。我们推测，在一致性和重要性维度上，渴求会自动化激活一致性寻求，表现为侵入性思维(Intrusive thoughts)间歇性进入意识领域。而在目的维度上，渴求激活的是控制性加工，启动自我调节过程，个体在评估需要可以达成的概率基础上做出是否寻求的决定。未来研究可以探索上述假设的正确性。

5.3 进一步加强意义寻求前置因素的实验研究

横断调查研究为研究者认识意义寻求的本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然而，这样的研究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例如，一个明确自己正在寻求生活目的的个体，如果没有进一步透露其它信息，我们将无从知道其是出于目标受挫，还是受到了其它更强有力目标的吸引。因此，为检验本文提出的模型，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已有实验研究提供了两种研究模式，一是通过实验室操纵某一变量，如社会排斥或死亡凸显，诱发意义危机，考察意义寻求倾向(Graeupner & Coman, 2017)；二是直接启动生活无意义感，如通过阅读一篇描述生活无意义可言的文章启动无意义感，继而测量意义寻求的变化(Taubman-Ben-Ari, 2011)。我们认为，已有的实验研究为本模型提供了初步支持，但大部分实验研究考察的均是意义危机诱发的意义寻求，鲜有报告源于外部诱因的意义寻求的研究。未来研究应着重关注这些变量对意义寻求的影响。

5.4 深化对意义寻求判断影响因素的研究

问卷调查研究与实验室研究虽然同为研究意义寻求的方法，但本质上，两种方法测量的因变量并不相同。实验法通过操纵情景因素，直接测量意义寻求的变化，其测量内容为意义寻求本身，而问卷研究中，所测量的意义寻求并非此刻情景的寻求动机，而是意义寻求判断，即通过回答问卷中呈现的问题表现自己的寻求倾向。已有文献中，对生命意义判断(Meaning in life judgement)的研究较多。生命意义判断是主观的、更依赖直觉(Hicks & King, 2009b)。个体判断生命意义感的主要依据是人际关系和积极情绪，并且两者可以相互补偿(Hicks & King, 2009a)。就我们所知，目前未有关注个体做出意义寻求判断的心理过程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未来研究应该致力于揭示其中的机制与相关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董蕊，彭凯平，喻丰. (2013). 积极情绪之敬畏. *心理科学进展, 21*(11), 1996–2005.

刘思斯，甘怡群. (2010).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4*(6), 478–482.

刘亚楠，许燕，于生凯. (2010). 恐惧管理研究：新热点、质疑与争论. *心理科学进展, 18*(1), 97–105.

简丹丹，段锦云，朱月龙. (2010). 创业意向的构思测量、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 18*(1), 162–169.

张姝玥，许燕. (2012). 高中生生命意义寻求与生命意义体验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6), 871–873.

赵娜，马敏，辛自强. (2017). 生命意义感获取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 25*(6), 1003–1011.

左世江，黄旎雯，王芳，蔡攀. (2016). 意义维持模型：理论发展与研究挑战. *心理科学进展, 24*(1), 101–110.

Austin, J. T., & Vancouver, J. B. (1996). Goal constructs in psychology: Structure, process, and cont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0*(3), 338–375.

Baumeister, R. F. (1991). *Meanings of life*.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Bodner, E., Bergman, Y. S., & Cohen-Fridel, S. (2014). Do attachment styles affect the presence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5), 1041–1059.

Chiu, C.-Y., Kwan, L. Y.-Y., & Liou, S. (2013). Culturally motivated challenges to innovations in integrative
research: Theory and solution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7*, 149–172.

Crumbaugh, J. C. & Maholick, L. T. (1964).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existentialism: The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Frankl’s concept of noogenic neurosi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 200–207.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Davis, C. G., Lehman, D. R., Wortman, C. B., Silver, R. C., & Thompson, S. C. (1995). The undoing of traumatic life ev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2), 109–124.

Dezutter, J, Waterman, A. S., Schwartz, S. J., Luyckx, K., Beyers, W., Meca, A., Caraway, S. J. (2014). Meaning in life in emerging adulthood: A person-oriented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2*(1), 57–68.

Eggleston, C.& Oishi, S. (2013). Is happiness a moving targ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eaning in life. In J. A. Hicks & C. Routledge (eds.),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Classical Perspectives, Emerging Themes, and Controversies*, (pp. 333–344). New York: Springer.

Emmons, R. A. (2003). Personal goals, life meaning, and virtue: Wellsprings of a positive life. In C. Keyes, & J. Haidt (Eds.), *Flourish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life well lived* (pp. 105–12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rankl, V. E. (1963).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

George, L. S., & Park, C. L. (2016). Meaning in life as comprehension, purpose, and mattering: Toward integration and new research question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3), 205–220.

George, L. S. & Park, C. L. (2017). The multidimensional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A tripartite approach to measuring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2*(6), 613–627.

Graeupner, D., & Coman, A. (2017). The dark side of meaning-making: How social exclusion leads to superstitious thin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9*, 218–222.

Haidt, J. (2003). The moral emotions. In R. J. Davidson, K. R. Scherer, & H. H. Goldschmith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pp. 852–870).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ntzelman, S. J., & King, L. A. (2014). Life is pretty meaningfu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9*(6), 561–574.

Hicks, J. A., & King, L. A. (2009a). Positive mood and social relatedness as information about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6), 471–482.

Hicks, J. A. & King, L. A. (2009b). Meaning in life as a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a lived experien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3*(4), 638–653.

Hooker, S. A., Masters, K. S., & Park, C. L. (2018). A meaningful life is a healthy life: A conceptual model linking meaning and meaning salience to health.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2*(1), 11–24.

Juhl, J., & Routledge, C. (2014). The effects of trait self-esteem and death cognitions on worldview defense and search for meaning. *Death Studies, 38*(1), 62–68

Kashdan, T. B., & McKnight, P. E. (2013). Commitment to a purpose in life: An antidote to the suffering by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Emotion, 13*(6), 1150–1159.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King, L. A., & Hicks, J. A. (2009). Detecting and constructing meaning in life event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5), 317-330.

King, L. A., Hicks, J. A., Krull, J. L., & Del Gaiso, A. K. (2006). Positive affect and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1), 179–196.

Kitayama S, Duffy S, Uchida Y. (2006). Self as cultural mode of being.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136–174).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Koltko-Rivera, M. E. (2004). The psychology of worldview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8*(1), 3–58.

Lepore, S. J., & Kernan, W. D. (2009). Searching for and making meaning after breast cancer: Prevalence, patterns, and negative affec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8*(6), 1176–1182.

Mangan, B. (2001). Sensation's ghost: The non-sensory “fringe” of consciousness. *Psyche, 7*(18), 1–35.

Martela, F., & Steger, M. F. (2016). The three meanings of meaning in life: Distinguishing coherenc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5), 531–545.

Negru-Subtirica, O., Pop, E. I., Luyckx, K., Dezutter, J., & Steger, M. F. (2016). The meaningful identity: A longitudinal look at the interplay between identity and meaning in life in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11), 1926–1936.

Park, C. L. (2010). 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literature: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ning mak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2), 257–301.

Park, J. & Baumeister, R. F. (2017). Meaning in life and adjustment to daily stressor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2*(4), 333–341.

Park, C. L., & George, L. S. (2013). Assessing meaning and meaning making in the context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Measurement tools and approach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6), 483–504.

Proulx, T., & Inzlicht, M. (2012). The five “A” s of meaning maintenance: Finding meaning in the theories of sense making. *Psychological Inquiry, 23*(4), 317–335.

Proulx, T., Inzlicht, M., & Harmon-Jones, E. (2012). Understanding all inconsistency compensation as a palliative response to violated expectati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6*(5), 285–291.

Ryan, R.M., & Deci, E.L. (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68–78.

Schnell, T. (2010). Existential indifference: Another quality of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50*(3):351-373.

Schulenberg, S. E., Baczwaski, B. J., & Buchanan, E. M. (2014). Measuring search for meaning: A factor-analytic evaluation of the Seeking of Noetic Goals Test (SO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3), 693–715.

Schwartzberg, S. S., & Janoff-Bulman, R. (1991). Grief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Exploring the assumptive worlds of bereaved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0*(3), 270–288.

Steger, M. F. (2013). Wrestling with our better selves: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In K. D. Markman, T. Proulx, & M. J. Lindberg (Eds.), *The Psychology of Meaning* (pp. 215–23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93.

Steger, M.F., & Kashdan, T.B. (2007). Stability and specificity of meaning in lif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ver one year.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8*(2), 161–179.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93.

Steger, M. F., Kashdan, T. B., Sullivan, B. A. & Lorentz, D. (2008a). Understanding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dynamic between seeking and experiencing mea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6*(2), 199–228.

Steger, M. F., Kawabata, Y., Shimai, S., & Otake, K. (2008b). The meaningful lif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vels and correlates of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3), 660–678.

Steger, M. F., Oishi, S., & Kashdan, T. B. (2009). Meaning in life across the life span: Levels and correlates of meaning in life from emerging adulthood to older adulthood.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1), 43–52.

Taubman-Ben-Ari, O. (2011). Is the meaning of life also the meaning of death? A terror management perspective repl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3), 385–399

Taylor, S. E. (1983). Adjustment to threatening events :A 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8*(11), 1161–1173.

Tolstikova, K., Fleming, S., & Chartier, B. (2005). Grief, complicated grief, and trauma: The role of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mpaired self-reference, and death anxiety. *Illness, Crisis and Loss, 13*(4), 293–313.

Thompson, S. C. (1991). The search for meaning following a stroke.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2*(1), 81–96.

Updegraff, J. A., Silver, R. C., & Holman, E. A. (2008). Searching for and finding meaning in collective trauma: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3), 709–722.

Uren, T. H., & Wastell, C. A. (2002). Attachment and meaning-making in perinatal bereavement. *Death studies, 26*(4), 279–308.

Vallacher, R. R., & Wegner, D. M. (1987). What do people think they're doing? A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human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94*(1), 3–15.

Vess, M., Routledge, C., Landau, M. J., & Arndt, J. (2009). The dynamics of death and meaning: the effects of death-relevant cognitions and 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on perceptions of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4), 728–744.

Wong, P. T. P. (2014). Viktor frankl's meaning-seeking model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In A. Batthyany & P. Russo-Netzer (Eds.), *Meaning in Positive and Existential Psychology* (pp. 149–184). New York: Springer press.

The cause of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Life affirming or deficit correcting

LI Zhanhong[1]; ZHAO Mengjiao[2]; LIU Huiying[3]; LIU Yanan[3]; PENG Kaipi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3] *School of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refers to the motivation and effort in understanding one's own life, finding or establishing life purpose, or accomplishing life significance. Unfortunately, consensus is still lacking on its cause. Deficit correcting hypothesis holds that, meaning search primarily originates from its absence or deficit, and once meaning restored, the search would decay. As opposed, Life affirming hypothesis maintains that, meaning search stems from the motivation to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life experience, and therefore the effort is always incessa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vidence, deficiencies and applicable situations of above two perspectives, and on this base proposes an "antecedent factor model" to account for the determinants of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This model hypothesizes meaning need as the premise of meaning search, and believe the motive to search for meaning would arise as long as the current "meaning level" is perceived to be lower or higher than the original stat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velop multidimensional meaning search scales, strengthen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explor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eaning search judgment.

Key words: meaning in life; search for meaning; life affirming; deficit correcting